

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逻辑*

——基于生态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分析

赵可金

【内容摘要】 随着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治国方略。基于生态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框架，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逻辑取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属性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生态体系，两者的有机结合决定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前进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大变局与中国大战略的统一，必须从根本上把握好世界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世界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国战略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内政上，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外交上，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引领世界向着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方向前进。总体而言，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逻辑，既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属性，也要准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所处的生态体系，在此基础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

【关键词】 百年大变局 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生态制度主义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作者简介】 赵可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北京 邮编：100084）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4)04-0001-20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404001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际秩序大变革对东北亚地区局势影响研究”（22JJD8100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① 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治国方略。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将带领超过 14 亿人口的中国步入现代化国家行列；中国的经济总量预计会在 2035 年达到 30 万亿美元的规模，这意味着中国不仅会继续缩小与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力量差距，而且还会不断拉大与世界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差距。毫无疑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仅会深刻影响世界格局的走向，而且还会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产生深远影响，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

中国式现代化提出后，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围绕中国的未来走向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国际社会展开了激烈争论。一些人担心中国会重走近代以来欧美列强寻求国强必霸的老路，^② 也有人预测中国已经选择走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③ 还有人揣测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中国会关闭对外开放的大门，回到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发展之路。^④ 随着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将推动中国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外交道路？其外交逻辑是什么？这一问题确实关乎中国发展的战略全局，不仅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而且也成为中国不懈探索的问题。2023 年 12 月底，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指出，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必须对标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任务，围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条主线，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这是在新时代新征程有效应对世界大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2 页。

② Alexia J. Butler, “21st Century Chinese Hegemony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Modern Diplomacy*, January 18, 2024, <https://moderndiplomacy.eu/2024/01/18/21st-century-chinese-hegemony-in-the-international-system/>.

③ Jake Sullivan and Hal Brands, “China Has Two Paths to Global Domination,” *Foreign Policy*, May 22,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5/22/china-superpower-two-paths-global-domination-cold-war/>.

④ “Is China’s Door Closing?” October 2018, Fiducia Strategy Advisory, <https://www.fiducia-china.com/is-chinas-door-closing>.

变局，“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是更好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①不难看出，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了新征程上中国外交战略的顶层设计，不仅在理论上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逻辑，也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擘画了未来发展的路线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生态制度主义视野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逻辑研究一直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既有的研究要么局限于西方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体系，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逻辑置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框架之下；要么局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体系，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逻辑归结为中国外交实践的逻辑。长期以来，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非常不利于推进中国外交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也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内在逻辑。

（一）“国强必霸论”及其批评

“国强必霸论”认为，一个大国崛起后必然会追求世界霸权，中国也不例外。这一论调强调中国不可避免地将与美国形成激烈竞争态势，世界可能会步入中美战略竞争的“新冷战”，^②甚至中美因激烈竞争而陷入“修昔底德陷阱”^③，这是一场“百年马拉松”。^④“国强必霸论”的核心不仅在于认为中国综合国力上升后必然会挑战美国霸权，而且将中国式现代化本身解为中国将建立与美国霸权不同的“另类霸权”，把中国式现代化歪曲为对“民主体系”形成威胁的“威权体系”，为美国加强对“民主国家”的控制提供借口。

事实上，在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之前，关于中国寻求“新霸权”和推行所

^①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年12月29日，第1版。

^② Alan Dupont, “The US-China Cold War Has Already Started,” *Diplomat*, July 8,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7/the-us-china-cold-war-has-already-started/>.

^③ 参见[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④ See Michael Pillsbury,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2016.

谓“新殖民主义”的论调就已经存在，这一论调的理论基础是欧美国家外交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流理论，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在内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均将中国视为“修正主义者”^①和“战略竞争者”^②，区别仅在于究竟关注中国实力上升造成的“崛起困境”和“安全困境”，^③还是关注中国实行不同于西方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制度威胁”^④和“文明冲突”^⑤。归根结底，从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体系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与西方不同的“异类”，无论中国提出什么样的发展战略，都会被戴着有色眼镜的西方国家解读为国强必霸的竞争逻辑，不仅中国崛起会被这样理解，所有非西方国家的崛起都会被界定为“他者”的挑战。

显然，“国强必霸论”的关键不在于中国要不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在于中国实力上升的趋势。只要中国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会被理解为必然走上追求霸权的道路，因为近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的外交逻辑就是霸权和反霸权。“国强必霸论”的逻辑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西方，它不能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逻辑，而只能解释西方现代化的外交逻辑。

（二）特色外交论及其批评

特色外交论认为，中国是一个与欧美国家不同的“例外国家”，表现在坚持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特色外交论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一个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不管实力达到什么程度都不会寻求霸权。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意味着中国不走西方国家国强必霸的老路，而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不仅没有挑战美国霸权的意图，也没有在世界上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对外扩张。^⑥

① Rana Mitter, “China: Revolutionary or Revisionist?”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5, No.3, 2022, pp. 7-21.

② Stephanie Christine Winkler,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US-China Relations: A Conceptual Analysi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6, No. 3, 2023, pp. 333-356.

③ Ghazala Yasmin Jalil, “China’s Rise: Offensive or Defensive Realism,” *Strategic Studies*, Vol. 39, No. 1, 2019, pp. 41-58.

④ Tarun Chhabra, “The China Challenge, Democracy, and U.S. Grand Strategy,” February 2019, Brookings,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the-china-challenge-democracy-and-u-s-grand-strategy/>.

⑤ Graham Allison, “China vs. America: Managing the Next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96, No. 5, 2017, pp. 80-89.

⑥ 高飞、杨晖：《和平发展绝不是权宜之计》，《人民论坛》2017年第25期，第56—58页。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政策主张，这是中国外交实践的鲜明特色。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也一直坚持不称霸的立场，“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①然而，中国外交的这一基本政策立场仍然停留在外交实践和政策理念的层面，还没有确立坚实的学理基础，将中国特色理解为中国外交实践无法替代理论上的科学论证。还有的学者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特色外交逻辑，认为中国的和合文化传统中没有侵略扩张的基因，中国古典思想文化是一种防御的文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决定了中国也不会走战争和冲突的老路。^②

无论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实践的政策解释，还是基于数千年中国古典外交实践的文化解释，都不能在学理上确立中国是一个例外国家的理论基础，也无法解释中国外交是特色外交的逻辑。一些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战备文化”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不必然是一个追求和平的国家。^③即使中国在历史上追求和平，也不一定能够解释中国在面临一些涉及重大核心利益问题上不会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显然，仅仅从中国应该与欧美列强的国强必霸的外交存在本质区别的应然角度来解释特色外交论，无法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实践逻辑。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逻辑还需确立实然如何的逻辑基础。

（三）基于生态制度主义的竞争性解释

既有研究存在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片面从西方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体系出发，无论何种角度论证都落入了国强必霸的窠臼，而单纯从中国外交实践和历史经验的知识体系出发，也无法找到中国式现代化在外交实践上的逻辑依据。之所以会产生上述困境，根本上在于既有

^① 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页。

^② 彭宗超、路璐：《中国和平发展的文化基因与历史经验》，《人民论坛》2022年第Z1期，第85—87页。

^③ [加]江忆恩：《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朱中博、郭树勇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6—109页。

研究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片面理解为国与国关系意义上的国际体系框架，只要将中国式现代化纳入国际体系的框架，就会面临要么沦为国家间竞争的形式逻辑，要么局限于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实践经验。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并非仅仅是国家的现代化，而是国家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统一，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精神关系的系统性调整。这些调整反映了一种生态体系变化而非国际体系变化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大变局并非功能性变化，也不限于结构性变化，而是涉及整个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系统性生态变化。

生态制度主义是一种关注生态体系变化对制度属性选择和社会秩序变革影响的理论路径，它超越了国际体系的前提假定，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生态开放性和资源稀缺度因素纳入政治分析框架，确立了生态选择制度、制度创造秩序和道路决定方向的分析框架。^① 生态体系最根本的特性是具有开放性。基于生态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框架，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逻辑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生态条件，两者的有机结合决定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逻辑和前进方向。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机统一，要求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② 中国式现代化规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逻辑，即中国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更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而是走守正创新、开放包容的新路，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基于生态制度主义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逻辑做出的研究假设。通过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属性和生态基础，可以检验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逻辑及其客观条件。

① 赵可金：《生态制度主义政治学》，《世界政治研究》2021 年第 4 期，第 1—26 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23 页。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属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① 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属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制度属性设定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性质、使命和价值。尽管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现代化都离不开现代政党的强有力领导，但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制度特殊性在于其不是一个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政党，而是一个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是一个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型政党。对于那些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利益型政党来说，其对外交事务的领导都是通过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的职业外交体系进行，政党一般不会走到前台直接开展外交。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无论是领导国家外交事务，还是参与社会外交事务，中国共产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制度特性。

（一）党管外交的政治属性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坚持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外交最鲜明的制度属性。中国式现代化是发生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相伴而生，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规律与劳动主导的社会主义规律并行不悖。如何在政治上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一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课题。只有加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才能始终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对外工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在对外工作上的体现就是始终坚持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资本主义现代化由作为其先进阶级的资产阶级引领，一般通过国家间接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2页。

领导外交，而不需要资产阶级政党直接领导外交。作为和平处理国际关系的官方渠道，外交最初被欧洲国家视为代表国家开展对外交往的活动，通常的做法是不打开国家的“黑箱子”，所有国家机构开展对外交往的过程均需通过职业外交机构开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和苏联的推动下，国际关系的概念替代了外交的概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甚至非政府机构等众多机构参与到外交过程中来，外交部转变为国家外交体系（national diplomatic system）。^①除了职业外交机构外，各国普遍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联邦安全会议等协调机构，将职业外交和非职业外交、官方外交机构和非官方外交机构统一在一起，在国际社会也出现了一个外交共同体。所有这一切都只是资产阶级对外事务的共同管理委员会，资产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选举、培养和选拔政治家，外交不是资产阶级政党的职能。

早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展不充分的条件下进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没有完成，只能依靠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开展各项工作。环顾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类似，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都普遍存在缺乏强大的先进阶级引领的问题，也都普遍依赖强大的政党领导，政党在外交中普遍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与众多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了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核心是坚持党对一切对外工作的领导。“对外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要强化统筹协调，各有侧重，相互配合，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确保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②

^① Brian Hocking,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National Diplomatic System,” in Pauline Kerr and Geoffrey Wiseman, eds., *Diplomacy in a Globalizing World: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26-128.

^②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网，2018年6月24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624/c1002-30079093.html>。

（二）民族复兴的外交使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坚持助力民族复兴，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使命。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等综合实力的快速上升，也伴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同时面临着与既有政治经济体系和霸权国家的复杂矛盾。如何在助力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化解中国与霸权国和既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摩擦和矛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问题。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逻辑受到民族复兴大逻辑的制约，不仅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安全型外交逻辑不完全一致，而且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型外交逻辑也不完全一致。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使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逻辑是安全型外交与发展型外交的统一。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欧美列强在世界上陆续崛起的过程，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对内表现为国家建设、民主化、福利化的过程，更多是通过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推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对外则表现为殖民扩张、强权政治和大国争霸，国家外交致力于解决国家间的利益矛盾，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是一种安全型的外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则主要集中于维持和巩固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并不会对霸权国和发达国家造成实质性冲击，其外交在融入和脱钩之间摇摆不定。相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统一，对外意味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成长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对内意味着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前者决定了中国的外交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具有相似的任务，致力于协调国家间的利益，也是一种安全型外交；后者决定了中国的外交具有服务发展的性质，是一种保障发展、助力发展的发展型外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到 2035 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①这就要求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要保持一定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日报》2021 年 3 月 13 日，第 1 版。

的增长速度，这也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使命。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价值。中国式现代化根本上是人（中国人民）的现代化，提升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落脚点，办好人民满意的外交也是中国外交的根本落脚点。中国的人口超过 14 亿，如何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问题。

外交服务于国家利益。具体而言，获取原料和销售市场是近代欧洲列强外交的主要任务，所谓的“自由”“民主”“法治”等价值观归根到底都是服务于资本的扩张。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自由”“民主”“法治”的价值观很快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所取代，建立殖民帝国和势力范围成为欧美列强的外交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列强主导建立了以联合国体系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中心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根本上也是为了实现以资本治理世界的意图。冷战结束后，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方案和以民主输出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方案被反复强调，并在“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涉、“保护的责任”、“普世价值观”等旗帜下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这仍然是为了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以资本为中心是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核心价值。

与资本主义国家确立的以资本为中心的外交相比，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外交。中国式现代化是带领 14 亿多人口共同步入现代化的超大规模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也意味着中国人民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这和历史上只有几百万、几千万、几亿人口规模的现代化有着根本差别。同时，与资本利益和国家利益相比，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是十分多样的，涵盖了就业、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和社会保障等各个领域，尤其是随着人民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移民、难民、旅游、劳工、贸易、投资等众多跨境事务和问题不断聚集，保护公民和法人的海外安全并优化海外服务日益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复杂外交挑战。显然，以人民为中心的外交比以资本为中心

的外交任务更重、难度更大、关系更复杂。

制度安排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供给，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它是一个集体本位的制度体系，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如何在开放条件下协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其他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重要外交问题。尤其是随着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国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美国的战略竞争。因国际力量对比变化造成的结构性矛盾和因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差异造成的制度性矛盾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大难题。能否找到制度调适之道，决定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未来，也左右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体系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且再一次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中国需要随时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的挑战，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所处的生态体系。处于十字路口的世界是一个变乱交织、危机叠加的世界，这在给中国式现代化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创造了一定机遇，如何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外交课题。另外，处于百年大变局的世界对中国来说不仅存在着国际力量对比引发的竞争，也存在着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而促成的合作。生态体系的变化赋予了大国在对外关系上更多的选择，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局势中，中国外交需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一）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

中国式现代化在大变局的世界中推进，也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发展。经济全球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将整个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大变局的世界也让全人类共同面临着大量全球性挑战，包括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传染性疾病、恐怖主义、能源短缺等，所有这些全球性挑战单靠一个国家或者少数国家都难以

有效应对。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面对百年大变局的世界和全人类的共同挑战，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外交逻辑。

第一，共同应对和平赤字。大变局的世界是国际力量分化重组的世界，威胁世界和平的因素在不同地区和不同领域积聚。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军备竞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甚至核战争依然威胁着世界，有组织犯罪、性别平等、种族矛盾和形形色色的亚文化群体的结构性暴力仍然大量存在，整个世界进入了多重矛盾交织叠加的时代，面临着再次陷入对抗与战争的风险。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努力消除和平赤字，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外交任务。

第二，合作应对发展赤字。大变局的世界是全球发展不平衡的世界，数字鸿沟、技术鸿沟、发展鸿沟在不同国家之间持续拉大。一些国家内部的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对外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构筑“小院高墙”、强推“脱钩断链”、实施“泛安全化”和“去风险化”限制措施，打乱了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秩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发展断层、技术鸿沟也不断拉大，甚至在发展机会上面临巨大差距。世界上仍然有 8 亿人口生活在饥饿之中，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正在发出求救的信号”^①。坚持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缓解国际发展赤字，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另一项重要外交任务。

第三，协同应对安全赤字。大变局的世界是全球安全不稳定的世界，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风险叠加，人类面临着复杂的安全挑战。一些大国不断释放战略竞争的信号，在技术、贸易、金融、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领域进行零和博弈，导致地区安全和大国关系变幻莫测。国际恐怖主义、政治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引发的震荡接连不断，来自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等领域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持续增加，使整个世界都面临巨大的安全压力。坚持做全球安全的提供者，缓解安全赤字，同样

^① António Guterres, “Secretary-General’s Address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United Nations, September 20, 2022,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speeches/2022-09-20/secretary-generals-address-the-general-assembly>.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外交任务。

第四，携手应对治理赤字。大变局的世界是全球治理面临改革与建设的世界，全球治理在众多领域都遭遇治理危机。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债务危机等都对全球经济治理造成极大挑战。全球安全形势严峻，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区热点问题使全球安全治理进展缓慢。全球气候变暖持续加剧，但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仍十分脆弱，绿色低碳转型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此外，在网络、深海、极地、太空、生物、人工智能等新疆域，有效的治理规则仍然未能确立，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依然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坚持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缓解治理赤字，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另一项外交任务。

（二）有效管控大国竞争

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上升，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与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存在着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重大风险。如何有效管控大国竞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际力量，营造一个和平稳定、合作共赢、客观友善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生态条件。

第一，探索中美正确相处之道。随着中国在 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加快了对华战略调整步伐，积极推进“重返东南亚”“转向亚太”“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进程，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美国明确把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者”，并在多个领域不断挑起争端，释放出大国竞争的信号。拜登政府执政后，继续推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大力推进“民主国家联盟”“供应链联盟”“印太战略”等针对中国的竞争战略，推动美日澳印“四国机制”（Quad）、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发展，致力于打造与中国进行全面战略竞争的全球盟伴体系。未来五到十年，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将采取各种措施遏制和打压中国，中国式现代化将面临来自美国的更大战略压力。如何适应中美关系的根本性变化，积极探索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制定正确的对美外交战略和策略，牢牢把握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和战略主动权，更好地维护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和

正当权益，是摆在中国外交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第二，积极运筹“新中间地带”的机会与空间。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除了少数国家会在中美之间采取明确的“一边倒”政策外，大多数国家会在中美两国之间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摇摆不定态度，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新中间地带”。总体来看，中国周边地区和全球南方国家等都可能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新中间地带”。这些地区的情况存在差异，处于不同的国际地位，面临着不同的发展问题，在与中美两国的利益关系上错综复杂，很难做出与中美之间的任何一个国家捆绑在一起的决定，而是更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左右逢源的战略对冲策略。因此，如何争取“新中间地带”的支持，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更大的发展机会与合作空间，成为中国外交战略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三）有效解决内部发展难题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面临着很多可预料和无法预料的内部难题，特别是中国逐渐步入中等收入阶层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等收入群体未来十几年将达到 8 亿人，^① 且“十四五”期间老龄人口将超过 3 亿，^② 中国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风险与挑战。如何满足中等收入群体和老龄人口的现实需要，积极化解经济社会领域存在的重大风险与挑战，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外交上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第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中国超过 14 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答题。“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靠别人解决吃饭问题是靠不住的。如果口粮依赖进口，我们就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③ 目前，中国每

① 《外交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利好世界》，中国政府网，2024 年 1 月 18 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1/content_6926866.htm。

② 《“十四五”老年人口将超 3 亿 “老有所养”如何保障？》，光明网，2022 年 9 月 22 日，https://politics.gmw.cn/2022-09/22/content_36040546.htm。

③ 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 年 12 月 23 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61 页。

年粮食总产量维持在 6.5 亿吨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谷物自给率超过 95%。^① 然而，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上升，中国的粮食需求扩大，居民膳食结构中的蛋白质比例上升。据海关总署统计，2022 年中国进口粮食约为 14 687.2 万吨，其中大豆进口达到 9 108.1 万吨，占粮食进口总量的比重约为 62%。^②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求在外交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尤其是确保蛋白质的稳定、足额、可靠供应，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第二，保障能源资源和供应链安全。确保能源资源及其供应链的安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答题。尽管煤炭产业还有较大上升空间，但能源供应安全的核心和难点是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依赖度上升。2022 年，中国原油进口为 5.08 亿吨，对外依存度为 71.2%，同比下降 0.8 个百分点；天然气进口为 1 520.7 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为 40.5%，同比下降 5.5 个百分点。^③ 2023 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为 92 24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7%，而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为 89 091 亿千瓦时。^④ 如何保障能源安全、能源的经济性和可持续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解决能源安全问题，需要推动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在主要立足国内的前提条件下，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利用国际资源。”^⑤ 同时，随着全球供应链格局重组，全球产业竞争进入“链时代”。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存在大而不强、全而不精、韧中有脆的“卡脖子”问题。2014 年 6 月 9 日，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

①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粮食安全》，中国政府网，2019 年 10 月 14 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19-10/14/content_5439410.htm。

② 海关总署：《2022 年 12 月全国进口重点商品量值表（美元值）》，2023 年 1 月 13 日，<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gk/2799825/302274/302275/4794311/index.html>。

③ 《2022 年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中国能源新闻网，2023 年 2 月 21 日，https://www.cpn.com.cn/news/yq/202302/t20230221_1585551_wap.html。

④ 《2023 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6.7%》，中国储能网，2024 年 1 月 18 日，<https://www.esn.com.cn/20240118/1216e073cec648959dd35b9acbf2857/c.html>。

⑤ 习近平：《积极推动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31 页。

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指出，“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① 如何打通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链、供应链卡点、堵点、断点，形成自主可控、稳定畅通、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是中国外交面临的新任务。

第三，巩固国家金融安全。金融是经济的命脉，金融安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短板。政府债务问题是影响金融安全的重要因素。自 2017 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以年均 16.3% 的速度快速增长，远高于同期名义经济增速的 7.8%，导致负债率攀升、债务风险不断累积。^② 截至 2022 年末，全国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余额为 35.1 万亿元，加上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余额 25.9 万亿元，全国政府债务余额为 61 万亿元。^③ 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行压力的增强，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中国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既高度关注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地产市场、影子银行、群体性事件等风险点，又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局部性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问题。”^④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金融安全，要坚持底线思维，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我们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通过延长处理时间减少一次性风险冲击力度，如果有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威胁，就要果断采取外科手术式的方法进行处理。”^⑤ 随着中国不断扩大开放，中国企业对国际资本市场的依赖度也在上升，如何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外交课题。

①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6 月 10 日，第 2 版。

② 邓海清：《多渠道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证券时报网，2023 年 6 月 28 日，<http://www.stcn.com/article/detail/902794.html>。

③ 《财政部有关负责同志就穆迪下调我主权信用评级展望有关问题答记者问》，财政部网站，2023 年 12 月 5 日，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2312/t20231205_3919789.htm。

④ 《从最坏处准备 向最好处努力——“我们为什么赢得良好开局”之四》，《人民日报》2014 年 1 月 6 日，第 1 版。

⑤ 习近平：《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32 页。

生态体系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需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相互激荡，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条件，也对中国外交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外交保障和优质的外交服务，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中国外交必须顺势而为、奋发有为，积极推动外交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有效解决自身发展难题的基础上，妥善管控大国竞争并合作应对全球性共同挑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

五、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构成

从生态制度主义视角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为新时代中国外交规划了路线图，要求中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一，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展什么样的外交，是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回答的根本外交问题。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多年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开放环境中才能实现。开放战胜封闭，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命之源，中国式现代化是高水平开放的现代化。无论是风平浪静的经济全球化，还是风高浪急的经济全球化，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生态条件，只有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才能在更大的范围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相反，强推内顾排外等措施会切断中国式现代化与生态体系的联系，不仅会增加民族复兴的成本，而且会从根本上制约中国式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中国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坚持把中国发展放到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和竞争力的基点上，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

第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关系，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重要外交问题。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壮大，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中国避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积极同世界各国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探索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不断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朋友圈”和“关系网”。面对中国与主要大国之间的竞争问题，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中国探索大国关系的正确相处之道，致力于构建总体稳定、和平共处、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竞争不是大国关系的全部，大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合作机会和合作空间，只要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大国之间完全可以走出一条良性竞争之路。面对中国与中小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中国探索大国与中小国家的合作共赢之道，积极探索构建睦邻友好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和守望相助的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面对大国博弈的压力，中国不要求中小国家选边站队，强调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义利兼顾，以义为先，努力走出一条大国帮助小国、小国支持大国的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共同进步之路。因此，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发展国际关系的内在要求，不仅大国与小国可以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而且大国与大国也可以建立新型国际关系。

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重要外交问题。生态制度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生态有机体，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世界处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之中。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从习近平主席 2013 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到 2015 年在第七十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五位一体”总体框架，再到 2017 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提出建设“五个世界”的总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王毅将其概括为：“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形成了新征程上中国外交战略的顶层设计。”^①同时，中国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积极倡导者，也是践行者。近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实践扎实推进、成效显著。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到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中国已经与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谅解备忘录，并推动在卫生健康、人与自然、网络、海洋等领域开展了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为各领域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注入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结 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神圣使命。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必须胸怀天下，带领中国人民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随着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治国方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②只有从这一要求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在国际社会必须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面旗帜的重要战略意义，也才能真正理解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基本逻辑。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理解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基本逻辑，需要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属性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生态体系两个因素。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属性来看，新时代中国外交必须坚持党管外交的基本原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调适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其他

^① 王毅：《深入贯彻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求是》2024年第2期，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4-01/16/c_1130059607.htm。

^② 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12月30日，第2版。

国家的社会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生态体系来看，新时代中国外交必须参与和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综合制度属性和生态体系两个因素，必须从根本上把握好世界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三者的逻辑关系，在世界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新时代的强国战略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内政上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外交上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引领世界大变局向着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方向前进，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逻辑。

总之，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逻辑，要求中国外交在服务国内发展目标如期实现基础上，经略好大国、周边和全球南方外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新时代的中国外交不会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更不会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路，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不会以某一国家为假想敌，也无意与其他国家争夺霸权。中国式现代化最大的战略考虑就是中国如何解决制约实现民族复兴的一些根本性战略问题，制定战略路线图，推出更多工具箱，化解外交面临的风险挑战，使拥有 14 亿多人口的国家步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责任编辑：石晨霞]

ABSTRACTS

The Diplomatic Logic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Politics of Eco-Institutionalism

ZHAO Kejin

ABSTRACT: As China embarks on a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become a governance strategy for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politics of eco-institutionalism, the diplomatic logic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depends on the institutional attributes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ecological system of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Considering the two factors of institutional attributes and ecological system,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the unity of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world and China's grand strategy. It is necessary to fundamentally grasp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world,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world,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strong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requires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In domestic affairs,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diplomacy, it is essential to hold high the banner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lead the world towards peace, security,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In summary, grasping the diplomatic logic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require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institutional attributes and ecological system, based on this, we should strive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WORDS: profound changes in a century,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co-institutionalism, great 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vertaking on a Curve: Late-developing Economies in Global Industrial Supply Chains

YU Zhen and CUI Jie

ABSTRACT: The restructuring of global industrial supply chains presents late-developing economie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overtake on a curve,”